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导航-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藏学

敦煌吐蕃文禅写本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作者：（日）上山大峻 著 杨富学 杨汉璋 译 撰写时间：1992-09-13 15:41:03 来源：西藏研究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2. 敦煌写本并不代表当时吐蕃文献的全部，这些写本被遗留于敦煌的原因还是不明了的。为此，用这些不完整资料进行研究，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危险。事实上，遗留下来的这些文献只不过是分散了的一小部分。[27]

将来，如果我们对研究敦煌吐蕃文写本的方法学有所进展，如果我们对敦煌的文化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我们在古代吐蕃佛教（包括吐蕃的禅宗）的调查研究中将有可能准确地使用这种敦煌资料。这将标志着用敦煌资料研究西藏的第三阶段。

III、研究吐蕃禅宗的前景

在意识形态上已被中国化了的禅宗，其经典竟被译成藏文并为藏族人民所接受，这个发现令人惊异。人们想象中的在吐蕃僧诤后被禁止的禅宗教义能得以继续流传，也出乎人们意料。当前重新改写吐蕃禅宗的历史，已成为研究禅宗、研究古代西藏佛教的一项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对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的意义和从事这项研究应掌握的方向，我提出三点看法：

1. 一些很有价值的早期禅宗文献，如《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等，在中国都已失传。这些文献是本世纪初在敦煌写本中重新发现的。它使早期禅宗历史的重构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从敦煌吐蕃文文献中寻找这一时期历史状况的资料已成为可能。已佚的文献，如降魔藏禅师的格言和《顿悟真宗要诀》的后部，在敦煌出土的汉文资料中并未发现，但现在可以在吐蕃文译本的基础上加以复原。有些文献既有汉文文本出现，又有吐蕃文译本存在，通过比较研究，有可能使文献的解释更为准确，并有助于辨识吐蕃文的人名等等。迄今为止，从敦煌发现物中辑录这些文献已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参照 I：1、13、16、17）。如果对敦煌写本以及宁玛派的教规作更细致的考查，那么，进一步的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收获。

2. 通过文献的证明，禅宗的藏传与发展在文献中得到证明，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地理解早期汉地禅宗的性质和它传播的范围。举例言之，小自氏（参见 I：4）依据吐蕃文资料重新改写了《历代法宝记》所载禅宗传入吐蕃的过程，我们由此增加了对当时保唐派的知识。根据吐蕃禅宗的倾向来辨识南、北两派之间的接触及其联合的资料也是可能的。

分类检索

- 经济
- 民俗
- 宗教
- 艺术
- 医药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社会
- 交通
- 学术
- 藏学
- 传媒
- 人物
- 教育
- 体育
- 科技
- 政法
- 语言
- 书评
- 环保
- 文化

3. 过去的禅宗研究是在汉地禅和日本禅两个领域内进行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吐蕃禅。吐蕃禅宗最初是通过形成于汉地的禅宗北派、南派以及保唐派的经典与导师传入的。但是，禅宗一进入西藏便受到了印度的中观学派与当时流入西藏的密宗的影响而使其变得独具特色。吐蕃禅宗在这些情况下的独特发展，现今正需要加以澄清。同时，这样一来，早期吐蕃宗教历史被歪曲的原因与范围以及8、9世纪间敦煌佛教的情况可能被揭示出来。

以下是吐蕃禅宗在现阶段需要研究的一系列问题的一览表：

(1) 对禅宗文献的教义内容与派系，以及早期传入吐蕃时它们的表现方式应予澄清。
[28]

(2) 对吐蕃僧诤的定性研究。 [29]

(3) 阐明佛教密宗的教义，如大圆满法与大瑜伽，以及它们与禅宗的结合。 [30]

(4) 阐明吐蕃的禅宗。 [31]

(5) 分析研究吐蕃世传史料及有关记录的失真。 [32]

最后，我还想预言将来对禅宗的研究必然还会走向另一个方向，尽管这已超出了吐蕃禅宗的范畴。我们已在吐蕃禅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回鹘、唐古特语文献多少迟于早期吐蕃文献，但可以肯定在禅宗流行与传播的时代，已经存在着用回鹘文或西夏文翻译的禅宗文献，尽管为数不是很多。如果这一研究证明富有成果，那么研究禅宗的范围将会惊人地扩大，与禅有关的许多至今犹未明了的历史终将大白于世。

[责任编辑 陶长松]

注释：

①a, 对昙旷的研究：

上山大峻：《昙旷与敦煌佛教学》，《东方学报》第75期，1964年3月，第141—214页。

评论：

山口瑞凤：《上山大峻著〈昙旷与敦煌佛教学〉》，《东洋学报》第47卷4期，1965年3月，第113—114页。

P·戴密微：《敦煌学近作》，《通报》第66卷1—3期，1970年，第29—44页。

b. 对法成之研究：

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研究》上，《东方学报》第38卷，1967年3月，第133—198页；下，《东方学报》第39卷，1968年3月，第119—222页。

评论：

P·戴密微《敦煌学近作》，第47—62页。

②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时间是在781至848年间，而戴密微与其它学者则认为当始自787年。

关于这一时期敦煌状况的精辟论著是藤枝晃发表的《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东方学报》第31期，1961年3月，第199—292页。

③“拉萨僧诤”这一术语，最先由P·戴密微用以叙述西藏历史上和尚摩诃衍与莲花戒之间的宗义论争（见戴密微《拉萨僧诤记》，巴黎，1952年）。当这一术语又被杜齐（见《小部佛典》第2卷，罗马，1958年，第32页）称作“桑耶寺僧诤”后，戴密微再将之改为“吐蕃僧诤”（见戴密微对《小部佛典》第2卷的评论，载《通报》第46卷3—5期，1958年，第408页。）

最初，我倾向于杜齐的说法（见《昙旷与敦煌佛教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这次宗义论争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不只限于在桑耶寺的争论，因此我将这次争论称作“吐蕃僧诤”，而冲本氏和其他一些学者则仍然名之为“桑耶寺僧诤”。

④吐蕃禅很早即为欧洲学者所注目：

拉露：《有关汉地禅宗扩展的藏文文献》，《亚洲学报》第231卷，1939年（该文研究了P. tib. 996）。

戴密微：《拉萨僧诤记》，巴黎，1952年（在第13—17页中考察了与摩诃衍禅师有关的吐蕃文写本P. tib. 116. 118和812）。

杜齐：《小部佛典》第2卷，罗马，1958年（在该书中杜齐以吐蕃文资料为基础，对禅的输入作了研究）。

石泰安：《顿悟——汉藏语中的术语》，《吉美博物馆年报》，1969第，第3—30页（在本文中石泰安以敦煌吐蕃文写本为依据讨论了术语“顿悟”与“渐悟”的意义）。

尽管上述著作均已发表，但在日本还未注意到它们的重要性。

⑤利用这些从缩微胶卷中收集来的资料，我于1970年6月向日本的西藏研究学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敦煌吐蕃文禅宗文献》的报告。在此文中，我概述了P. tib. 116. 121. 812. 813. 及S. tib. 710. 468和709的内容。

⑥《五部遗教》叙述五金林巴（生于1323年）离开隐居地雅砻一事。该书的第五部分《大臣遗教》内容包括对渐悟派与顿悟派的讨论。杜齐在《小部佛典》第2卷第68—81和81—191页中发表了这一部分的罗马字母转写和英译文。

⑦《禅宗明镜》亦即人们所熟知的Rdzogs chen gyi man nag bsam gtan mig sgron、Rnal 'byor mig gi bsam gtan和Sgom gyi gnad gsal bar Phye ba bsam gtan mig sgaon，为生活于9世纪的儒僧gNubs Chen sans rgyas ye ses所作。它于1974年作为Smanrtsis Shesrig Spendzod Series卷74，由拉达克列城的S. W塔什冈帕所出版，今枝由郎于1974年从E. G. 史密斯处得到此出版物，将其介绍给日本学者。从该文献的题记判断，似为对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的汇编。但正如冲本氏已经觉察到的那样（参见 I：10），此文献很有可能已为后世的学者篡改过。

⑧今枝氏于7月16日至21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9次东方学者国际会议”的大会上发表了关于

此资料的口头介绍。他的研究心得于1945年在日本发表（参见 I：9）。

⑨该吐蕃文文献至今犹未发表。对这篇论文的评论见戴密微《敦煌学近作》第46—47页，我也在《楞伽师资记》吐蕃文译本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藏译楞伽师资记所见若干问题》（《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1卷2期，1973年）的文章，着意分析该文献汉译本中的资料。

⑩在注④中曾提到，戴密微于1962年即已辨认出P. tib. 116. 117与812系摩诃衍禅师所作。但在发表这一文章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发现。

[11] 按照冲本氏的看法，S. tib. 703的内容包含着与P. tib. 116相同的材料（见 I：7）

[12] 关于卧轮禅师的身份及他的语录，吴其昱于1973年7月以（P. tib. 116所见卧轮禅师考》为题的论文在巴黎第29次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宣读，但我并未见到该文的复制件。

[13] 觉察到《大臣遗教》中的几段文字与P. tib. 116中相同的人是龙谷大学的毕业生小自宏允。

[14] 对该文献的校订和法文摘译，由R. S. 石泰安发表于《拔协》（巴黎，1961年）一书中。

[15] 冲本氏以道林（741—824年）比附dehu lim sen si。这样，他为824年的P. tib. 116的编辑建立了一种terminus ante quem，并论证此文献并不是当时对“吐蕃僧诤”的记录，但以道林比附Dehu lim，其证据是不充分的。而且，构成P. tib. 116的各种文献并非都完成于同一时间。譬如，《顿悟真宗要决》的藏译在8世纪末（参见 I：17）。不同时期写成的各种文献，是被后人按照本文所论文献的模式才将其收集在一块的，只有这样推测才可能准确。如此看来，即使被包含于P. tib. 116之内的与吐蕃僧诤同时代的这些资料，也与汇编内的后期文献并无抵牾。

[16] 杜齐：《小部佛典》第2卷，第68、81页。

[17] M. 拉露：《有关汉地禅宗扩展的吐蕃文文献》，《亚洲杂志》第231卷，1939年。该文包括P. tib. 996的原文模拟、罗马字母转写与法译文。

[18] 对敦煌汉文译本已有许多研究。关于对该领域的精辟概述已由藤枝晃用英文刊发，题曰《敦煌写本概述》第一部分，《人文》（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纪要）第9期，1966年，第1—32页，第二部分，《人文》第10期，1969年，第17—39页。

[19] 拉露，《敦煌藏文写本目录》I、II、III，巴黎，1931—61年。该目录描述了伯希和获取的2216条保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吐蕃文写本。本文中，伯希和吐蕃文写本被缩写为P. tib。

波森：《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吐蕃文文献目录》，牛津，1962年。题录了现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765件由斯坦因爵士所获的吐蕃文文献，这部分写本在本文中简称S. tib。

[20] 以下是研究敦煌出土佛经写本的部分论著目录（不包括此前我对法成和禅宗的研究）：

拉露：《敦煌出土大般若波罗蜜多罗经藏文写本》，《亚洲学报》，1964年。

藤枝晃、上山大峻：《敦煌本藏译无量寿宗要经》，《版本学与目录学杂集》第23辑，1962年，第345—356页。

上山大峻：《敦煌出土藏译般若心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3卷2期，1965年3月，第779—783页。

吴其昱：《台北国立图书馆藏四卷藏文写本考察》，《纪念拉露西藏学论文集》，巴黎，1971年，第667—571页。

F. 比肖夫、C. 哈特曼：《莲花生的法术——P. tib. 44号写本》，《纪念拉露西藏学论文集》第11—28页。

木村隆德：《敦煌出土藏文写本莲花戒作金刚经广注》，《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4期，1975年12月，第273—241页。

除佛教的专门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对敦煌藏文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

巴科、托玛斯、图散：《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巴黎，1940—46年。

托玛斯：《新疆吐蕃文献文书集》1—4卷，伦敦，1935—63年。

拉露：《8世纪大蕃官吏诉请状》，《亚洲学报》第243卷，1955年。

J. W. de Jong《西藏喇嘛教历史残片》，《纪念拉露西藏学论文集》第127—141页。

麦克唐纳：《关于P. tib. 1286、1287、1038、1047和1290的释读——兼论松赞干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与使用》，《纪念拉露西藏学论文集》第190—391页。

R. A. 石泰安：《敦煌藏文写本中的仪轨故事》，《纪念拉露西藏学论文集》第479—547页。

下列历史研究是以敦煌资料为依据的：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上、下），京都，1958—59年。

[21] R·A·石泰安于1968年11月访问日本时，针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性质与内容给日本的西藏研究协会作了概括性论述。

[22] 阐述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的历史情况，充分利用遗留在那里的吐蕃文文献很有必要。藤枝晃和我都认为对当时历史的研究仅依据汉文的或西藏本土的资料是不够的。藤枝晃的《吐蕃统治时期之敦煌》，以及我对法成的研究，都很注意利用有关的敦煌吐蕃文文献。

[23] 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这一作品附有《顿悟大乘正理决》的影印图版及大量的法文译释。这一划时代的作品标志着敦煌与西藏研究的新转折。

[24] 杜齐：《从藏文资料看桑耶寺僧诤》，《小部佛典》第2卷。在第1章中，他证实了Dpa'o gtsug Phren ba 派文献《法源》中出现的人物与见于《顿悟大乘正理决》中的那些相符。

[25] 杜齐对藏文记录的准确性提出了疑义（见《小部佛典》第2卷，第46页）。

[26] 在我研究P. tib. 116文献时对此有所注意。（参见 I. 3）

[27] 上山大峻：《敦煌出土藏文写本的资料性》，《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第21期，1975年3月。

[28] 我曾想，禅宗是摩诃衍禅师应邀经敦煌前往拉萨时传入西藏的。但小自氏则认为保唐派先于摩诃衍经由南诏王国而进入西藏。现在，我坚信可以有更多的设想：1) 甚至在“吐蕃僧诤”后，禅宗资料还在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西藏；2) 这种流入也可能如同P. tib. 996所证实的那样，是从中亚通过的。

[29] 关于“吐蕃僧诤”，至今还有许多疑问需要澄清，诸如事情发生的时间及进行的方式都是如此。今枝由郎甚至对和尚犯摩诃衍是否曾与莲花戒相遇过都表示怀疑，其理由是吐蕃僧诤与西藏历史（见 I：9）所描述的情况迥异。柱齐说：“简言之，对桑耶寺僧诤的说法，我们要以小心谨慎的态度去接受。”（《小部佛典》第2卷，第153页），说明接受藏文资料对“吐蕃僧诤”的描述，还是相当困难的。

我的意见也认为这次宗义论争的实际情况及其结果与西藏历史所记载多少存在着差异。

[30] 我现在觉得禅宗可能已与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在西藏出现并在那里活动《大圆满法》的大瑜伽相融合了。在“吐蕃僧诤”时。禅宗与印度的佛教徒之间肯定会存在着对抗。但很有可能，顿悟派与渐悟派的教义又为第三者，即密宗的《大圆满法》所综合利用。禅和大瑜伽文献相互联系正是其迹象。同时也有可能，个别的人物如维摩拉密多罗与贝杨在这个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如此，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粗略的估计，将来还需要对宁玛派的著作（如《禅宗明镜》）作进一步的研究，西藏历史资料与敦煌材料都需要重新考察，才能把事情搞清楚。我已在《贝杨著大瑜伽文献P. tib. 837》（载《龙谷大学佛教义化研究所纪要》16，1977年6月）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31] 小自氏强调禅在西藏是循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多见 I：14），我同意这种见解。西藏禅宗的特色是什么，我期冀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使之更加明晰。与此同时，向这个目标迈进还需要阐明以下两个问题：1) P. tib. 116所记载的派系，即“龙树”、“菩提达摩多罗”、“无住”、“降魔藏”、Arday hver、“卧轮”、“摩诃衍”等等；2) P. tib. 996所载宗教传播的意义。

[32] 在吐蕃佛教后弘期，印度佛教在这里得势。而在山口瑞凤看来，和尚摩诃衍在“吐蕃僧诤”中失败，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在此环境中，宁玛派的任何公开性著述（包括与汉地佛教联合的证明）都显得踌躇不决，它也只宣扬那些经过印度教虚饰过的东西。山口氏认为布顿的历史著作反映的就是后弘期宗教流布的特征（参见山口瑞凤：《西藏佛教与新罗金和尚》，《新罗佛教研究》，1973年）。

今枝氏也发现了益希达颜的著作在布顿历史著作中被归之于摩诃衍。

以这些观察为基础，我考虑禅宗的历史自尊者阿底峡之后即被作为异教而被排除于西藏历史记录之外。当时，印度的佛教十分昌盛，被视为绝对的正统。在这一阶段，印度佛教由于宗义论争的胜利而受到系统的阐述。即使《大圆满法》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与早期禅宗概似，宁玛派积极否认这种观点的事则暗示着上述情况的流行。

[33] 川上天山：《〈六祖坛经〉西夏语译本》，《支那佛教史学》第2卷2期，1938年9

月。

西田龙雄：《西夏语禅籍译本》，《西夏文华严经》，京都，1975年，第16页。

[作者简介]

杨富学，1964年生，现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现已发表论、译文40余篇。

杨汉璋，1913年生，现为敦煌研究院专职翻译，发表译著有《丝绸路上外国魔鬼》等。

1, 2, 3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网站声明](#)

[合作加盟](#)

[频道导航](#)

[广告服务](#)

[人才招聘](#)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版权所有

Copyright© China Tibet Information Center

E-mail: webmaster@tibet.cn Tel:010-58336000

京ICP证 041074